


[\[科研成果首页\]](#) - [\[所有科研成果\]](#)

[项目类型] 专职人员科研成果  
 [成果题目] 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问题  
 [作者姓名] 李春隆  
 [成果类型] 论文  
 [出版单位] 东北亚论坛  
 [出版时间] 2003年12月

## [成果摘要]

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关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殊阶层”问题谈论的有很多，但还不见专门的论述。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有其制度上的原因，它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发展到顶峰。勃列日涅夫以“稳定”当头，不思改革，带头奢靡腐化，致使这个掌握人民权力的阶层终于走向人民的反面。

## [成果全文]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问题，人们不大愿意涉及，几乎成为禁区。苏联解体后，人们在探讨其解体原因时，曾提出“官僚”和“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最近又有专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文章问世。本文拟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并通过一些新的史料，进一步证明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脱离人民的本质。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整，是苏联国力最强的时期，但也是苏联由盛转衰的时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消耗殆尽，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已显露出难返之势，“官僚特权阶层”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之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突现出来，可能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政治体制上的原因。十月革命前，列宁曾设想未来的国家实施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即“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但十月革命后列宁看到的却是，原来寄以希望的“国家的主人”——工农大众，由于文化水平低下而没有能力管理国家，只能由布尔什维克党代表人民掌管政权。权力由人民集中于一党，实现权力集中的第一步。在干部的任用上，列宁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委任制。布尔什维克党的上层成为国家权力核心，实现权力集中的第二步。又加上当时艰苦的斗争环境，干部的作风比较端正。但是，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起自列宁时期，而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心底无私，发扬民主，实行集体领导。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产生官员特殊化的最好土壤。对此，列宁初期没有足够地重视和认识。当列宁发现新的国家出现官僚主义时，还只作为旧官吏带来的旧作风。可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机构增多，官僚主义很快泛滥起来。这时，列宁痛心疾首，他不得不承认“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将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让合并后的新的监察机构拥有与党中央平行的权力，其成员“应享有与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这里的“平行”就是“制衡”。可惜的是列宁这一重要思想没被其接班人所理解和接受。

第二，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作为列宁事业的接班人斯大林，通过3次党内斗争，消灭了所有政治对手，把党、政、军的一切大权集中到一人手中，实现了权力集中的第三步——个人专制。斯大林首先将干部任命制度化。从1923年开始，斯大林就指派莫洛托夫起草有关文件，在11月8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工作上任命干部，仅中央一级的党政领导干部就任命达13 165人。自此开辟了列表“封官”的先河。斯大林在干部问题上，一方面对异己干部进行“清洗”，乃至肉体消灭；另一方面对顺从的干部提拔重用，予以特殊待遇。斯大林经常给干部发放工资以外的所谓的“红包”，有的数额惊人。例如，一位部长竟然到2万卢布的“红包”，相当于戈尔巴乔夫当总统时期工资的2倍。此外，这些高级官员还享有享用别墅、特别旅游疗养等待遇。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访问了莫斯科，发现了在标榜人民平等的国家里，居然有包括高尔基在内的苏联党政领导人和知名人士，住着豪华的住宅，过着奢侈的生活。他在《莫斯科日记》中写道，在苏联已经形成一个“共产党的贵族阶级”。俄国的学者也说：“形成特权阶层这件事……还是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获得很大的规模”。

第三，赫鲁晓夫的改革冲击了“官僚特权阶层”的制度。赫鲁晓夫在干部问题上实行干部轮换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苏共二十二大通过新的党章规定：每届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因

员至少更换1/4，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3届。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新党章还规定区委以上机关的成员连任不得超过3届，其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以及设有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每届任期4年；不设州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以及市委、区委领导机构的成员，连续当选不得超过3届，每届任期两年；基层党组织书记连续当选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任期1年。如果超过规定任期而欲继续连任者，则必须有3/4以上的投票赞成。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各级领导干部也照此办理。

在轮换干部的操作中，往往比规定的还要激进。据报道，党的州委、边疆区委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中，担任这一职务不满3年的占70.5%，党的区委和市委的书记工作不满3年的占78.8%。1963年选举中，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州委会的成员更换了一半以上，市委、市属区选出了3/4以上的新成员。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选举中更换了近70%。赫鲁晓夫还在治理干部特殊化方面进行了改革，如大幅度降低干部的工资等。

赫鲁晓夫在干部制度方面的改革，冲击了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具有进步意义。方向是正确的。但由于实施过急，方法欠当，引起社会动荡和干部普遍不满，特别是损害了特权阶层的利益，结果改革半途而废。

总之，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重要原因；“官僚特权阶层”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它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赫鲁晓夫干部制度改革的失败，很容易为后来者在改革路上望而却步。所有这些，构成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特权阶层”问题日益严重的基因和前提。

## 二

勃列日涅夫正是在“官僚特权阶层”的拥护下。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赫鲁晓夫、走上苏联政权顶峰的。他吸收赫鲁晓夫“整”干部的教训，在国家治理上，以“稳定”为目标，以笼络干部为手段，以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勃列日涅夫是个中庸之辈，他嗜权如命，贪图虚荣，追求享乐，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达到了顶峰。

### 1. 庞大的国家机关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废除了赫鲁晓夫按生产原则划分的“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恢复了州和边疆区统一的党组织。苏联政治体系中的其它组成部分，如苏维埃、工会、共青团等组织也采取了统一领导，全国权力垂直集中到中央。中央不仅从整体上进行规划，甚至下面的具体条例和工作细则，也要由中央制定。据统计，到80年代初，苏联下达的各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指令、指示和其它大小法规达到20万种之多。而要完成如此浩繁的任务，没有一整套的官僚机关是无法完成的。从1965年至1982年勃列日涅夫离开人世，全联盟各部和兼共和国的各部增加了5倍多，达160个。有的部级官员多如牛毛，以黑色冶金工业部为例，设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他们之间也有排序)，副部长15人。结果这个部总共有正副部长19人。机关增多，随之而来的是官员增多，这个时期苏联有“干部”1800万，其中150万为下层干部。按全国职工的人数平均，每6—7个职工有一位顶头上司。据测算，苏联每年仅供养这些官员，国家要拨出10%的预算。

### 2. 老化的官僚队伍

1966年4月召开的苏共23次代表大会，取消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干部按比例轮换的规定，接之而来的是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出现了“老人政治”的局面。赫鲁晓夫时期的二十二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占49.6%；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二十三大，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则上升为79.4%；二十四大时上升为83.4%；到了二十六次时竟然上升为90%以上，几乎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在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8年中，变动微乎其微，只换了12人。领导干部老龄化问题很快显露出来。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则为54.1岁；到了1981年26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上升为70.1岁，书记处为68岁。勃列日涅夫领导核心成员平均年龄为75岁。这些年岁已高的领导人不仅精力匮乏，而且有的百病缠身，真是病夫当政，误国误民。

### 3. 无限的个人崇拜

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比较重视集体领导，也比较注意到地方和基层去了解情况并研究工作。苏共通过决议，规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永远分离，不得兼任”，由此形成了苏联所谓“三驾马车”的领导结构。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勃列日涅夫就处心积虑地提高和突出自己的地位，不断加强和扩大个人的权力。1977年，波德戈尔内因在宪法的某些提法与勃列日涅夫相左而被解职；1980年，柯西金也因在经济改革上与勃列日涅夫产生分歧被罢免。勃列日涅夫把他们的权力都揽在自己的手里，身兼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国防会议主席之职，集党、政、军所有大权于一身。

独揽大权便大搞“造神”运动，这几乎成为规律。自1973年“五·九”起，苏联一改原来国家领袖按姓氏字母为序的规定，而把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放在独尊的地位。这一天，全国的一切新闻媒体都以最大的声势，歌颂这位“非凡”的“天才”。有人发现，在当天苏联最大一家的报纸上，勃列日涅夫的名字出现多达72处。此后，歌颂领袖的浪潮此起彼伏，调门一高再高。勃列日涅夫是“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英明的领袖”、“英明的理论家”、“世界和平的旗手”，不一而足。与此同时，一版再版勃列日涅夫的言论集和回忆录，称赞他的著作是“党的巨大瑰宝”、“政治才略的教科书”、“令人爱不释手的诗篇”。在他当政的18年中，曾4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7次被授予“列宁勋章”，这都是国家最高的奖项。至于其它奖项随时可得，据统计，“他一生所获的勋章和奖章总共近二百枚。

勃列日涅夫是苏联最大、最高的官僚。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达到如此程度，勃列日涅夫是应负历史责任的。

## 三

“官僚特权阶层”是苏联的当权阶层。这个阶层有着自己特殊的利益乃至特殊的心态和文化。他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名曰“人民公仆”，实则是地道的“老爷”。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阶层更暴露出其贪婪性和腐朽性。下面根据新的史料来看其在几个方面的表现。

### 1. “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殊收入”

苏联中等收入的工人和职员月工资是257卢布。苏共中央一位部门主任月工资为700卢布。普通劳动者的假期一年是12—18天，而中央委员会的假期是30天，且不包括路上往返时间。这位部门主任在休假期间照样领取工资，不仅如此，他们还格外发给所谓用于“治病”的附加工资，即第13个月工资-700卢布。实际上这位主任休假期间的一切费用由国家全包，根本不需要个人花销。因此，这一部门主任实际上比一般人多领2个月工资，即1400卢布。如果把这两个月的工资平均到其它11个月上，这位主任实际月工资为827卢布30戈比。

此外，部门主任还领“克里姆林宫餐券”。这是类似“营养食疗”的餐券，上层的官员人人皆有一份，未必只发给疾病患者。名曰为“餐券”，实则是票券，用来领取特殊配给的上等食品。此项每月发90卢布，1年12个月则是1 100多卢布。值得注意的是，克里姆林宫的“餐券”是按1929年的价目表计算的，价格只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1/4，也就是说，这里90卢布相当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300多卢布。这样，这些官僚们每年仅“营养食疗”餐券一项又多得了3 600卢布。如按11个工作月平均，则这位官员的实际月工资应为1 154卢布。这已是中等工人和职员工资的5倍。当时苏联还有广大的低收入者，如普通的工人和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士兵等，月收入不到150卢布。这样，这位苏共中央一个部门主任的收入则是低收入者的8倍。

不仅如此，如果部门主任再略会一些外语，他还可以领取10%的附加工资。那么他的实际工资就更是多得多了。

## 2. “官僚特权阶层”的“官价”

干部选举制度在苏联早已名存实亡，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场日益腐败。要想做官或者升迁，必须讨好或贿赂有关领导，久而久之，卖官鬻爵现象发生。一位逃往西方的阿塞拜疆中央委员会情报部工作人员，提供了阿塞拜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

一个区检察长的职务，价值3万卢布(按1969年价格)；一个警察分局局长的职务，则更贵了一些。要用5万卢布；集体农庄主席5万卢布；国营农场主席8万卢布；阿塞拜疆共产党区党委第一书记手握重权，所以价格最贵，要用20万卢布(1969年)，第二书记职务值10万卢布；社会保障部长的职位值12万卢布；城市公共事业部长值15万卢布；商业部长的职位值25万卢布；大学校长的职位20万卢布；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院士称号是5万卢布；科研院所所长4万卢布；剧院院长1—3万卢布。

普通百姓是没有能力买官的，因为如上所述，以苏联中等收入工人和职员为例，他们月工资为257卢布，如果他们要弄到区委书记的职务，得需要劳作81年；如果以月收入为150卢布的普通劳动者为例，他们每月需要缴纳21卢布的公民税及工会会费，再除去用于购买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必需品的78卢布，每月最多只能积攒51卢布，如果他们要弄到区委书记的职务，则需要劳作408.5年。

卖官鬻爵的现象在其它加盟共和国也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 3. “官僚特权阶层”的权力世袭

俄罗斯学者指出：“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

苏联的官僚不仅自己执政终身，而且极力把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后代。权力继承之风在苏联早就存在。自斯大林时期始，权力继承作为“官僚特权阶层”的“专利”就开始出现。斯大林的儿子在20多岁时便提为中将，接着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赫鲁晓夫的女婿曾担任苏联第2大报纸《消息报》的主编，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此等等。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官僚阶层明显形成了超越社会的利益集团。官官相护，官官联姻。首先他们对现有权力的垄断，接着便是利用自己职务的影响力，扶持后代掌权，及早进入官僚阶层。

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利，本是纨绔子弟，生活花天酒地，虽然年纪轻轻，但仍能当上苏联外贸部第1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本是一位低级军官，仅用了10年的时间就晋升为上将，不久又担任内务部第1副部长(该人在勃列日涅夫过世之后罪行被揭露，贪污受贿65万卢布，构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柯西金的女儿很轻松地当上了国家外国文献图书馆的馆长。米高扬的儿子平庸无奇，可是研究生毕业之后，直接担任《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职务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干部同级。格罗米柯的儿子先是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院工作，后来很快派出国，先后担任驻美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使衔参赞，不久又提升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其官位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官员同级。苏联的层层领导都照此办理，全国上上下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太子党”。

综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可以看出，苏联的官员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正是苏联社会真正危机之所在。列宁早就说过：“对于一个人数不多的共产党来说，对于一个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一个大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共产党来说，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列宁的警告颇具预见性，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您是第1191202位访问者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林园路1788号

邮编：130012

电话：86-431-5166393

传真：86-431-5166396

E-mail: yuxiao@mail.jlu.edu.cn